

GUAN SHANG

ZHI JIAN

官商 之间

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马 敏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官商之间

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马 敏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001号

年
记

集

官商之间

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马 敏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 插页 300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01-01954-6/K·262

定 价：13.60元

序

章开沅

近几年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是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讨论的热门课题。冉玫栎(Mary B. Rankin)对浙江地方精英的研究，罗威廉(William T. Rowe)对汉口商人组织的研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晋、直、鲁新政的研究，大多认为清末民初中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而资深学者如魏斐德(Fredrick Wakeman, Jr.)、孔复礼(Philip A. Kuhn)等，则对上述论点持断然否定态度。前年，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期间，曾去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参加过他们的研讨会，两派争论之激烈给我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美国学者思想活跃，重视通过个案研究寻求理论解释，常能为我们提供若干新的视野、思路和参照系统。但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差异，以及中文资料的艰深难解，他们的陈述与判断有时又难免流于片面与粗疏。即如上述争论，尽管持否定论者批评持肯定论者以西方模式强加于中国历史，而实际上在他们自己的论述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影响。正如柯文(Paul A. Cohen)所自我标榜的中国中心主义一样，其实它本身也没有完全抹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子。

无论是在国内或在海外，我常劝一些年轻学者不必老是跟着西方学者惯用的理论概念兜圈子，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对他们的学术成果的贬抑和排拒。中国历史是一部源远流长、独立发展的大国

的历史，虽然它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且与时俱进地受到外在世界愈来愈多的影响。西方历史模式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照，而不可作为认知、评判中国历史的主要依据，更不可简单借用为陈述、解释中国历史的框架。我认为，西方学者对于“市民社会”、“公众领域”的讨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如果我们不花大力气作这种扎扎实实的研究，却单纯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从概念到概念地争论中国有无“市民社会”、“公众领域”，那就是舍本而逐末，从土教条主义转向洋教条主义。

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马敏教授以整整十年的时间，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的绅商问题，其结果便是现今出版的这本专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本书时空跨度很大，从古代“士”阶层的兴起、传统绅士阶层的形成和演变、绅商合流的萌发，一直延伸到近代绅商阶层的形成及其角色和作用；同时又通过绅商阶层的类型区分、社会属性、社会功能、政治参与的探讨，与西方的早期资产阶级作众多层面的比较，然后再附带陈述自己对于“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的见解。书中对于绅商数量的估计，把绅商区分为士人型、买办型、官僚型并分别作个案论析，有关绅商过渡特征与中介角色的理论探讨，从“公”的领域到近代城市公益的扩展，新式商人社团的整合及其活动轨迹等部分，都有很多深具功力的新见。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近代中国绅商研究，而且可以深化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

战后西方有关中国绅商的研究起步甚早，50年代初始何炳棣、张仲礼的绅士研究即已发其端绪，60年代末在芮玛丽(Mary C. Wright)组织推动下，一批东西方学者更加热衷于近代绅士或社会精英(elite)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观点各异而又颇具功力的论

著，而其流风余绪至今未衰。相形之下，我国绅商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长期比较冷落，这可能与史学领域的泛政治化消极影响有关，一谈到“绅”便联想到“土豪劣绅”，使研究者望而却步或至少是堵塞了思路。80年代以后，对于个别绅商人物（如张謇、周学熙等）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缺少把绅商作为整体的宏观研究的专著。马敏此书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既吸收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前此的研究成果，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自己的真知新见，并且构筑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绅商研究理论体系。马敏属于8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学者，思想活泼而又严谨治学。他不轻易发表作品，已经出版的论著大多能够体现学术境界的提升，此书的付梓使我们高兴地看到他又攀登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并不认为此书已经完美无缺，无论从国内学术界还是从作者个人而言，绅商研究毕竟还是处于初始阶段。我国传统史学多半侧重于研究王朝与政府，1949年以后转而侧重于研究人民，特别是下层民众，倒是前后都忽略了政府与百姓之间那块不算大也不算小的空间。UCLA的黄宗智教授曾称之为“第三领域”（the third realm）。“第三领域”也好，“公众领域”也好，无非是探索这块不算大也不算小的空间，探索在这块空间中活动着的人和事，其中就包括绅士→绅商→新式社会精英。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一个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如何保持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适度空间，如何在这个空间营造“政府——中介——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并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这是一门大学问，更是一椿大工程，决非少数历史学者坐而论道所能迎刃而解。当然，人们也不必对学者寄予过高期望，即令是他们的最高研究成果，也无非是为理解社会历史的某个层面提供一把钥匙而已。加拿大陈志让教授曾经写过一本《军绅政权》，份量不大却很精辟，是从政权结构的角度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提供一把钥匙。而马敏此书，如果也能从绅商研究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一把

探近代中国国情奥秘的钥匙，那就是这位年轻学者极大的成功。

本书对于绅商阶层生活方式与心态变化的刻划，虽然颇下功夫，但毕竟不够丰满。绅商阶层是活生生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心态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一样，都是介乎新旧之间与官民之间，都有很多极为丰富而又多种多样的内容。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志向抱负与事业追求，也有自己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生活。他们的工作、应酬、休闲乃至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都能从各个侧面反映这个阶层的共性与个性，都能更为突显这个过渡性社会群体的角色与形象。当然，一本书的容量总是有限的，总不能满足那些贪得无厌如我之类读者的形形色色要求。我们不妨再作等待，或许可以在作者未来的新著中得到这方面的新知。是为序。

1994年春重返桂子山之后一月

目 录

.....	章开沅(1)
论：绅商	
——一个历史的透视点	(1)
第一章 “熊掌与鱼”	
——绅、商合流的历史回溯	(9)
第一节 传统绅士阶层	(9)
一、“士”阶层的兴起	(9)
二、“士大夫”的世界	(14)
三、“绅士”的涵义	(20)
第二节 古代商人阶层	(27)
一、“伊壁鸠鲁的神”	(27)
二、“四民社会”秩序	(36)
第三节 绅、商合流的萌发	(45)
一、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异动	(45)
二、“士商相混”——绅与商的早期对流	(54)
第二章 “物竞天择”	
——绅商阶层的形成	(64)
第一节 “千古变局”的冲击效应	(64)
一、近代社会大变动	(64)
二、晚清重商主义的兴起	(70)
第二节 绅、商合流的增强	(80)
一、由商而绅的渗透	(80)

	DK666/5
二、由绅而商的转化.....	(86)
第三节 绅商阶层形成的标志	(93)
一、“绅商”的内涵.....	(93)
二、谕设商会的意义.....	(97)
三、绅商的数量估计	(105)
第三章 “人以群分”	
——绅商的社会解析.....	(109)
第一节 士人型绅商.....	(109)
一、“贾而好儒”的儒商	(109)
二、张謇与经元善	(113)
第二节 买办型绅商.....	(121)
一、买办与买办的绅化	(121)
二、唐廷枢与郑观应	(125)
第三节 官僚型绅商.....	(133)
一、官商与绅商	(133)
二、盛宣怀与周学熙	(138)
第四章 “将新未新之际”	
——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	(148)
第一节 与传统的不解之缘.....	(148)
一、行业构成与经营方式	(148)
二、乡土渊源	(160)
第二节 跨入近代的门坎.....	(180)
一、绅商的实业投资	(180)
二、新的营运方式	(188)
三、生活方式与心态微变	(197)
第三节 典型的过渡性阶层.....	(205)
一、绅商与近代资产阶级	(205)
二、过渡特征与中介角色	(209)

三、国际比较	(213)
--------------	-------

第五章 “独立社会之起点”

——绅商的社会功能.....	(220)
第一节 绅商与社会公益.....	(220)
一、“公”的领域	(220)
二、近代城市公益事业的扩展	(227)
第二节 绅商与社团.....	(243)
一、传统商人组织	(243)
二、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	(250)
三、新式商人社团的整合	(261)
第三节 绅商与“市民社会”.....	(270)
一、城市自治中的绅商	(270)
二、“市民社会”的雏形	(281)
第四节 绅商与南洋劝业会.....	(292)
一、中国首次博览会	(292)
二、绅商的作用	(297)

第六章 “商旗所指”

——绅商的政治参与.....	(304)
第一节 绅商与民族主义.....	(304)
一、绅商的民族意识	(304)
二、抵制美货的领导者	(312)
三、收回利权的中坚力量	(318)
第二节 绅商与立宪运动.....	(328)
一、绅商的参政意识与方式	(328)
二、宪政参与与国会请愿	(334)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绅商.....	(341)
一、绅商与辛亥革命	(341)
二、民初绅商的演化	(356)

余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商关系.....	(368)
后记.....	(381)

附表目录

表 2—1 苏州工商公所部分董事功名、职衔来源	(83)
表 2—2 苏州商会(第三届)绅商功名、职衔来源	(83)
表 2—3 天津商务总会总协理及会董名单(1907 年)	(100)
表 2—4 天津静海县独流镇商务分会会董名单(1910 年)	(102)
表 2—5 苏州商务总、分会职员功名、职衔统计	(104)
表 2—6 1912 年全国绅商人数估计	(107)
表 4—1 第一届(1904 年)上海商务总会的行业构成	(150)
表 4—2 天津绅商行业构成情况	(151)
表 4—3 苏商总会历届议董所属行业	(153)
表 4—4 尤先甲等苏州上层绅商产业及收入情况表	(162)
表 4—5 山东矜恕堂瑞蚨祥分店设置情况表	(168)
表 4—6 荣家企业高级职员构成表	(171)
表 4—7 苏州会馆创建人成份	(177)
表 4—8 四川各省会馆所供神祇及主要建筑	(178)
表 4—9 张謇等 12 名绅商创办、投资企业情况(1913 年 以前)	(182)
表 4—10 祝大椿等 6 名买办型绅商创办、投资企业情况 (1913 年以前).....	(184)
表 4—11 绅商在近代商办采矿业中的投资	(185)

表 4—12	19 家大纱厂创办人情况(1895—1910 年)	(187)
表 4—13	晚清苏州新式商业公司情况	(193)
表 5—1	晚清苏州的慈善类局、所	(228)
表 5—2	天津及附近地区戒烟社团与机构的成绩 (1906—1909 年)	(238)
表 5—3	各行业(公所)奉祀的神祇	(246)
表 5—4	苏州公所的成份构成	(249)
表 5—5	全国商会历年统计表(1904—1913 年)	(256)
表 5—6	天津商务总会与公安总会的职员互渗情况	(266)
表 5—7	上海自治机构上层人选情况	(274)
表 6—1	1907—1911 年各省收回矿产统计	(319)

引论：绅商

——一个历史的透视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一系列空前的社会变动，中国社会流变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新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以科举功名和职衔、顶戴为标识，附骥于官场，又同时广泛涉足工商经营活动，孜孜牟利，成为晚清到民国初年一支举足轻重、极其活跃的社会集团力量。

绅商阶层的形成，是中国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其他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性、特殊性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多层次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官、绅、民的准科层(*semi-bureaucracy*)体系，近于无限的君权和庞大有序的官僚机器构成高度科层化的专制国家政权，但由于小农经济和乡村家族制度的发达，近代的科层政权往往仅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运作，则有赖于绅士来维持。绅士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掌握着文化知识，他们进则为官，退则为民，充当着官与民之间的中介或桥梁，构成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举凡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兴办水利、道路、学校、慈善等公益事业，无一不经由绅士来操办。因而，在官、绅、民三者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关系中，绅士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关键性的。自秦至清，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等级结构则体现为“士农工商”的金字塔状的基本格局。在这一社会等级结构中，“四

民并列，士属先尊”^①，绅士和商人阶层，一个高居四民之首，备受尊崇；一个忝居四民之末，受到社会的轻蔑与排挤，二者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社会等级鸿沟。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②。过去的研究，多强调科举制度导致绅士阶层内部成员经常不断地更新，相对加强了上下社会流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森严的等级结构及其引发的社会紧张与矛盾，保证了专制国家政权相对的活力与效率。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并可由此解释中国集权官僚政治的长期延续^③。从理论上说，这是正确的。但同时必须明确，在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是单向性的，其价值定向在于“士民之首”的绅士阶层。与科举制度相联系的社会流动并未改变“士农工商”社会等级结构的基本格局。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流动并不可能造成社会阶级关系的质性变化，绅士集团仍然是社会流动的汇合点和终点，维系传统社会内部稳定和社会均衡，舍绅士阶层莫属。

正因为绅士阶层是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中枢和官僚政治的基石，因此，考察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型，首先即应注目于绅士阶层的流转变迁。如果说，在传统绅士集团的近代转型中，以“兴学育才”，从事新式教育为矢志的“学绅”构成从封建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或自由职业者过渡的中介桥梁，那么，“绅商”则成为传统绅士向近代工商资本家转化的中介桥梁。这种转化又是通过由商而绅和由绅而商的双向社会流动的途径来实现的。绅与商的相互渗透融合，终于突破了士农工商尊卑有序的传统格局，使绅与商这两个处于等级结构两端的社会阶层相互趋近和吸纳，氤氲化生出具有近代因子的新的社会群体——“绅商”。亦绅亦商的绅商已不

① 《劝儒道者信道文》，《教会新报》（一），305页。

② 《论居官经商》，《申报》1883年1月25日。

③ 参见何炳棣等的著作。

再是传统意义的绅士或商人，但又尚不够真正近代工商资本家的资格，而仅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体”或“中介物”。它兼具新旧两个时代的性格与特征，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折、过渡的历史行程，构成一个观察近代社会阶级关系转型的绝佳历史透视点。诚如已故史学名家陈旭麓先生所指出：“绅商（由商而绅，由绅而商）和乡绅是官与民的中介，前者多在市，后者多在乡；前者与工商业结缘，后者与宗法、地租联姻；从他们身上可以捕捉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脉络”^①。

二

作为一个特定的新兴社会阶层（而不是分散的个别人物），绅商群体主要活跃于堪称“千古变局”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因而对辛亥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关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是国内学者与海外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在内）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一段“公案”。近20年来，海外一些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绅士运动”说。他们把研究旨趣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和阶级结构考察上，力图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内部运动来探求这场革命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中虽不乏某些新颖、独到的学术见解，然而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有的学者断言，辛亥革命中扮演主角的士绅“是保守派，对仿效西方不感兴趣”，因此，辛亥革命所发生的仅仅是“改朝换代”^②。“这场革命不是以‘现代’势力对‘传统’势力的胜利，而是以中国社会内部长期权力斗争达到登峰造极而展现出来”^③。也有的学者并不完全赞同上述见解。美国学者周锡瑞

① 《陈旭麓学术文存》1378页。

② [日]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

③ [美]柯文(Paul A. Cohen)：《美国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蔡尚思等著《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第326页。

(Joseph W. Eshrick)便认为不应当忽视清末城市传统绅士阶层所发生的分化、转型,提出以“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这个术语描述绅士阶层中分化出的一批新人,他们“明显地区别于旧式绅士阶层,但它尚未成长为资产阶级”^①。法国女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更为明确地指出,清末存在一种绅商合流的历史倾向,“士绅和尚未取得明确社会地位的新生的(商业)资产阶级已经融合成为一个绅商阶级”^②。日本学者小岛淑男也认为是“商绅”阶级在光复上海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③。然而,多数学者仍继续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白吉尔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是以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为背景的,因此,“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而不是一场西方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④。周锡瑞则认为,辛亥革命是由一个西方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所领导的社会变动。“在许多方面,1911年的革命,是一个很不革命的革命”^⑤。爱德华·罗兹也认为,广东地区的辛亥革命并不是一次社会革命,而毋宁是一次“有利于商人和新绅士的城市化的政治和文化革命。”不幸的是商人并没有足够强大到可以形成一新的政权的基础^⑥。

看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判断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如何评估绅士集团的近代转型。本书认为,尽管绅商阶层同传统绅士和旧式商人阶层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但从本质上已不同于二者,在新的时代氛围下,其价值趋向是“近代”

①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8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法]白吉尔:《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第240页。

③ [日]小岛淑男:《辛亥革命中的上海商绅阶层》,载《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1960年版。

④ 同②。

⑤ 同①,“引论”。

⑥ [美]爱德华·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年》,1975年版。

的，而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虽然尚不可同完全意义的近代资产阶级划等号，但它已初步具有近代工商资本家阶级的某些经济、政治和思想特征，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而构成早期工商资产阶级的主干^①。因此，不是绅商（或新绅士）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而是近代绅商阶层本身就归属于早期资产阶级（处于转化、形成过程中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全国范围内，绅商人虽不算多，但由于他们财力雄厚，享有特别的社会地位，并通过各种类型的新式社团组织相连结，故而具有很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在早期资产阶级参加的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和立宪运动中，绅商扮演了领导和骨干的角色；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绅商仅扮演了二流角色，他们通过从权应变，对革命施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当然不单纯是由参加者的社会成份所决定，但资产阶级化绅商的附义，多少有助于说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社会阶级基础。至少，以“传统绅士运动”说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似乎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席卷到革命大潮中的绅士，在很大程度上已是非传统的了。过去常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传统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联系？很大程度上即是通过绅商阶层的中介沟通。绅商阶层中有功名和职衔的商人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大大超过工业资本的畸形经济发展，已直接造成商业资本阶级居支配地位的畸形阶级结构。而如人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商业资本和西方近代商业资本不同，它们虽然也和工业资本发生一定联系，但主要地还是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互为依存，有的商业资本并继续和封建性土地经营纠结在一起，这就使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难以划清同地主阶级的经济界线。其

^① 所谓早期资产阶级，系指资产阶级的不完备形态，即过渡形态，时间上约为1860—1913年。